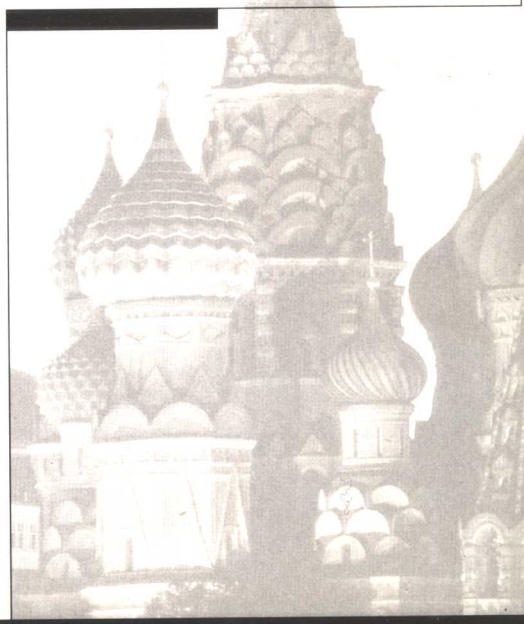


世 初有道

[俄] M.B. 戈尔巴涅夫斯基 著
杜桂枝 杨秀杰 译

揭开前苏联尘封30年的往事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世初有道

В НАЧАЛЕ БЫЛО СЛОВО

揭开前苏联尘封 50 年的往事

〔俄〕M. B. 戈尔巴涅夫斯基 著

杜桂枝 杨秀杰 译

乔双信 审校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初有道:揭开前苏联尘封 50 年的往事 [俄] 戈尔巴涅夫斯基著;杜桂枝、杨秀杰译

-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ISBN 7-80112-446-4

I. 世… II. ①戈…②杜…③杨… III. 语言学-讨论-概况-苏联 IV. H3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8805 号

责任编辑	齐长虹
封面设计	韩青云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65523123 65523819
社 址	北京市朝外大街吉祥里 208 号
邮 编	100020
印 刷	长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1-4516
书 号	ISBN 7-80112-446-4/K·005
定 价	16.8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内容提要

在 20 世纪,特别是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在我们伟大邻邦的那片国土上,曾创造出了许多神话。马尔及马尔主义就曾是苏联语言学界的神话,他的《语言新学说》被奉为惟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语言学,统治苏联语言学达 20 多年。

马尔曾有过很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但也不乏坚定不移的反对派。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学术之争和科学上的不同观点,却招来了各种形式的迫害。在苏联语言学历史上演出了一幕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悲剧。

1950 年春夏之交,斯大林亲自发动了一场在《真理报》上开展的语言学大讨论,并亲自发表文章,批判了他亲自栽培起来的马尔主义,从而结束了马尔主义一统苏联语言学的历史。斯大林的这些文章被收集成册,以《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为书名大量发行,成了人们后来所知的马、恩、列、斯十大经典著作之一。

作者在探究斯大林发动语言学大讨论的历史背景、真实原因、作用、影响及后果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甚至接触到了克格勃档案中某些尚未完全解密的档案资料。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和令人深思的人物命运故事:

语言学大讨论第一篇檄文出笼始末;

斯大林对契科巴瓦的紧急召见;

毛泽东与斯大林深夜长谈语言学;

马尔的“汉语初级阶段”论激怒中国留学生;

传奇人物波利瓦诺夫的悲惨命运;

“不倒翁”费林的“科学之路”;

维诺格拉多夫不作“襡裪”式学者……

译 序

关于语言和语言学,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们都有过许多精言妙语,马、恩、列、斯也都曾作出了精辟的论述。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是人们感知世界、认识世界和表达思想的具体手段。纵观历史,语言的产生、使用和发展总是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历来各朝各代的政权无不十分关注语言学领域的发展和变化。例如,在我国历史上,秦始皇在统一了中国之后,曾作出了“书同文,车同轨”的英明决策,但也曾有过焚书坑儒的愚蠢之举。无论英明还是愚蠢,其目的无非是要用语言、用文字为巩固自己王朝的政权统治服务。20世纪初,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不久,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立即提出了“改革文字,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以及为各少数民族语言建立字母文字”这样十分艰巨而伟大的任务,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语言文化建设的高潮。正是在这一伟大事业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积极的、有才能的语言学家。然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他们的科学生涯,甚至人生命运却大相径庭。

在苏联语言学史上,马尔曾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语言新学说”曾名噪一时。马尔是一位考古学家、语言学家、高加索学专家和历史学家。他创立的雅弗语学说,当时被奉为语言学中惟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语言学理论,称作“语言新学说”。1928年~1929年,对马尔的“语言新学说”的神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凭借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和庇护,马

尔主义者在语言学界大搞军警式统治,在学术上实行“一言堂”,对反对派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这样的学术风气,笼罩苏联语言学界达 20 年之久,许多正直的有才华的语言学家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研究领域,离开了语言学界,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甚至离开了这个世界。直到 1950 年,斯大林亲自动了一场在《真理报》上开展的语言学大讨论,并亲自发表文章,批判了他亲自栽培起来的马尔主义,结束了马尔主义一统苏联语言学的历史。斯大林的这些文章被收集成册,冠以《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书名,成了我们后来所熟知的马、恩、列、斯十大经典著作之一。

从严格的科学角度来看,马尔的“语言新学说”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它的很多理论命题,如“语言的阶段分类”、“四元素分析法”和“语言的古生物研究”等不仅与唯物主义的语言学格格不入,而且可以说是完全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伪科学。那么,它何以统治苏联语言学界达 20 多年?斯大林为何在经过多年的支持和栽培之后,在给马尔封以各种耀眼和吓人的桂冠之后,又亲自打倒了他?长期以来,这一直是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一个谜团,也是苏联语言学界,乃至整个科学界忌讳的一个话题。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改革之风才吹开了这一禁区的大门。随着“公开化”进程的发展,新闻媒体和知识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得以探究许多禁锢多年的问题。《世初有道》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问世的一部关于语言学历史的纪实性著作。

《世初有道》一书(В начале было слово)是俄罗斯语言学博士 М. В. 戈尔巴涅夫斯基教授于 1989 年动笔,1991 年完成的一部力作。在多年的教学与研究中,作者一直关注着苏联时期语言学发展的情况,潜心研究那一时期的各种文献资料。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苏联时期的许多内部档案材料,其中包括克格

勃档案馆中的部分资料相继解密。这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并于1989年首次在《文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泰斗的提纲”的文章,首次披露了20年代和50年代苏联语言学史上的两次大讨论的背景和内幕。此后,作者又收集和研究了更多更详实的材料和证据,在“提纲”的基础上完成了《世初有道》的创作。

该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九章,为作者所著。主要内容有:(1)介绍马尔此人,“语言新学说”出台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及马尔主义形成的社会根源;(2)当时语言学界对这一理论的看法,许多语言学家与马尔进行的斗争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3)马尔及其追随者在苏联语言学界是如何大搞“一言堂”,对学术上的反对派和持不同看法者进行打击和迫害,并统治苏联语言学界20多年;(4)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斯大林开始站出来反对马尔,1950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出台的前前后后。这一部分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如:斯大林急召格鲁吉亚语言学家契科巴瓦赴莫斯科,探讨语言学问题,并授命他撰写发动语言学大讨论的第一篇檄文;《真理报》主编被请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请他为自己的“老乡”审稿;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别墅,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语言学问题举行过一次特殊的会谈,毛泽东对马尔的雅弗语言学理论提出了不同见解。作者推测认为,中国朋友对马尔的“汉语低级阶段”论的反感和不满是促使斯大林下决心推翻马尔主义理论大厦的动因之一。

第二部分共七章,分别援引了事件当事人的文稿、有关人士的回忆和后人的评论。

该书是一部纪实性著作,内容丰富,材料翔实,文笔生动,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语言学史研究的参考价值。一个众所周知

的事实是,自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之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很多方面就以“老大哥”为榜样,甚至有过“全盘照搬”的时期,苏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和变化无不对我国产生深刻的影响。语言学也不例外,在我国的语言学界,特别是俄语学界,对苏联语言学中的马尔——“语言新学说”——马尔主义,对斯大林的题为《关于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小册子都不陌生。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一直是我国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指南,教育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然而,我们却对发生在列宁故乡的那片土地上的重大事件的内幕和真实背景知之甚少。《世初有道》一书掀开了语言学历史上的这一页,使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这段历史重见天日,为长期以来一直困惑着人们的许多问题提供了答案。

需要指出的是,史料纪实性作品的翻译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性译著,它要求严格地尊重客观事实和历史,把握作者的意图,把历史的某一个侧面完整准确地再现给广大读者。本书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每一个事件都有具体的时间、地点、相关的背景资料,书中还采用了大量的引言和佐证,加之作者本人集教授、斯拉夫语言学史专家和新闻工作者等数职于一身,具有很独特的写作风格和语言表达特点,文中使用了许多比喻和暗指,所有这些都增大了翻译的难度。译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此书的翻译。全书译文用词贴切,文笔流畅,既准确无误地再现了历史人物和事件,又保留了原著的语言风格和特点,充分显示了译者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同时还体现了译者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学术风格,实属难得。

常言道,历史是一面镜子。在我们跨入新世纪之际,回顾和

评价整个 20 世纪语言学的发展,不能不关注苏联语言学的这段历史,特别是 20 年代至 50 年代初,马尔主义统治苏联语言学界期间,对其造成的危害和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了解和研究历史既是对历史的思考,也是对未来的警示。相信每一位严肃的读者读完此书,都会掩卷长思,自然会对书中的人物和事件作认真的思考,并会在思考中得出自己的答案。在此,我想强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当我们渴望和呼吁建立宽松自由的科学环境和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同时,也不容忽视和忘记个人的科学良知,不能偏离做人之“道”。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准则决定了他的科学生涯和人生命运,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某一时期某一科学的发展和历史进程。曾几何时,有人春风得意,有人身陷囹圄;有人飞黄腾达,有人客死他乡……其中的是非曲直,忠奸善恶,虽如浮云掠过,但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痕迹。

语文学博士、教授 刘利民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

2001 年 7 月

此书谨献给我最亲近的人——

我的妈妈卡丽娜·达尼洛芙娜·戈尔巴涅夫斯卡娅。

她的一生中曾经历过——

斯大林葬礼上那痛苦的眼泪；
1956年那令人头晕目眩的“真相”；
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时代的停滞；
对四月胜利*小心翼翼的企盼和
那些新的疑虑……

——作者

* 戈尔巴乔夫执政(1985年3月11日)后,在4月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宣布,必须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实行改革,1985年4月成了改革开始的象征——译者注。

序 言

这本书的序言本应由科学院院士鲍利斯·亚历山大洛维奇·谢列勃林尼科夫来写,因为他与1950年斯大林发动的那场“语言学大讨论”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但命运却做出了另外一种安排:1989年,这位著名的语言学家、独具风格的思想家、出色的辩论家永远离开了我们。发表在《文学报》上的一篇悼念文章写道:“谢列勃林尼科夫是最先站出来参加1950年那场语言学大讨论的学者之一。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严厉批驳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及其追随者鼓吹的‘语言新学说’。这一学说在那个年代曾在语言学领域中独占统治地位。”^[1]

这是不争的事实。对谢列勃林尼科夫当年的这一大无畏行为,在这本书的许多章节中都有描述。那么,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首先,这本书详细记述了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一系列理论文章是如何出台的,它们的真实背景及可能的原因,以及后来这些文章又如何汇编成册,冠以《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书名,以单行本的形式大量发行,风靡一时。其次,该书评述了斯大林时期语言学历史的某些特点和史实。在描述由“伟大领袖”于1950年发动的、在《真理报》上展开的这场语言学大讨论,剖析他对语言学问题表现出的空前的热情和兴趣的原因的同时,书中还论及了俄罗斯语言学“履历”中的另外一些阶段、重要时期和许多历史事件。其中的许多章节充满悲剧色彩,读后令人不胜感慨和悲感。

作者米哈伊尔·维克托罗维奇·戈尔巴涅夫斯基力图把那一段历史尽可能完整地再现给广大读者：在什么条件下形成了马尔院士的《雅弗语学说》（语源统一论，后来这一学说被称为《语言新学说》）；它是如何登上科学—政治“奥林匹斯山”的巅峰的。马尔现象作为当时苏联科学界的一种独特的“运动”，几乎成了语言学界的“骑士团”。毫无疑问，这一切是斯大林个人崇拜和军警式社会主义异化了的道德价值观的琼浆玉液滋养出来的产物。本书作者对马尔学说的兴趣主要在于：在大讨论期间，斯大林曾对马尔主义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同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该学说曾是苏联语言科学中的某种氛围的基点。通读该书，您将会了解到“语言新学说”中的许多基本论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戈尔巴涅夫斯基的这一著作是第一部评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全面而翔实的力作。作者以客观事实、真凭实据和历史文件为依据，第一次揭开了苏联语言科学中许多鲜为人知，甚至已渐被遗忘的历史片段：摆在读者面前的不是一部枯燥无味的科学院研究报告，而是出自一位经验丰富、感情洋溢的记者和评论家之手的引人入胜的长篇力作。作者把科学的命运放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历史政治环境的大背景下去思考、研究和描述，使之更具感染力和震撼力。

该书共分两大篇章：上篇是作者的叙述部分；下篇是特殊的文选部分：各种文件，不同流派的学者的文章及讲演的片段，包括上篇中涉及的事件的参与者和同代人的证词或回忆，以及作者对这些材料所作的简短介绍和注解。

虽然在这本书中讲述的是已经过去了的事件，但它仍不失为一部非常适时的、十分符合现代生活节拍的佳作。当前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既不是最终目的，也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为实现近期目的和远大目标进行斗争的武器。

1989年3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被崇拜的人物和被用来吓唬人的东西》的述评,评论家尼古拉·波达波夫向我们昭示了同样的思想。这篇评述的内容十分丰富,曾占了整版的篇幅,文中某些段落对回答戈尔巴涅夫斯基在撰写本书时提出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在此援引其中一段:

“……我们有一部分同胞,即便他们不是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也会这样认为:翻历史旧账,重揭过去的伤疤,再现大清洗时的恐怖——这无疑是在正在前进着的改革列车的轴箱中掺沙子,这样做会使纪律涣散,士气沮丧,从而转移主要目标。但事实并非如此。不治愈历史留给人们的痛楚和社会近视症,带着过去时代绊脚的错觉和偏见,就不能坚定地走向明天。勇敢地面对过去——这是我们赖以在精神上成长和道德上健康的‘荷尔蒙’,否则,我们这个社会就不可能从被斯大林主义催眠术麻痹了几十年的理性之梦中彻底地苏醒过来。虽然,斯大林主义的严厉鼻祖早已不在人世,但操办追悼亡灵的酒宴还为时尚早,因为这一主义的思潮在停滞时期又开始死灰复燃,至今仍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2]

这一见解也可以作为《世初有道》一书的总体评价的一个例证。因为当读完该书时,您会确信,在停滞时期我们的语言科学的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斯大林主义复苏的倾向,特别是在科学的“管理”中。虽然戈尔巴涅夫斯基对那些年代的描写很简短,但仍然可以说,这在苏联评论界尚属首次。我认为,这一点正是他的著作的一大优点。

再来谈谈戈尔巴涅夫斯基感兴趣的主要内容——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杰作”产生的历史。这位头戴皇冠的“杰作”的创作者,以其不容反驳的严厉批评,向马尔院士的学说发动了猛烈的抨击。请您在读书时注意一点:语言学界的马尔时代,实质

上是臭名昭著的李森科主义的翻版(在这一点上,作者是完全正确的)。然而,马尔理论的结局,马尔及其信徒一统语言学科天下的结局却不同于李森科。李森科非常幸福地、生活十分充裕地走过了“伟大的慈父和导师”的时代,后来甚至竟能骗取极端敏感的赫鲁晓夫的信任。在斯大林生前产生的马尔主义最终被“所有科学的泰斗”给否决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应了解事件的详细情况,掌握事实证据,因为并非被斯大林严厉批评的一切都是宝贵的、真实的、合理的。

以本人拙见,对广大读者来说,《世初有道》一书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它还表明,对于衰老且日益虚弱的领袖而言,对马尔主义的严厉批判从某种程度上讲只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也许,我的这一论点可能会被认为是有争议的(戈尔巴涅夫斯基引人入胜地分析了斯大林决定研究语言学问题的某些完全现实的理由和原因)。但该书作者做出的另一种令人信服结论应不会引起争议:斯大林的语言学研究并没给语言学带来任何一点新东西,他的语言学“发现”只不过是一些早已存在的最基本、最原则性的语言学思想。本人以为,《世初有道》一书对年轻一代——不仅是对语言学、历史学、哲学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十分有益——而且对所有的关注我国不远的过去的年轻人都特别有益。

我无意使该书的序言过分冗长,也不想使读者的注意力放在过多的具体材料上,但却不能不援引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在一篇鲜为人知的文章中阐述的相当准确的思想:

“目前,我们的社会道德规范发生了明显变化。它正在经历一场心灵上的震荡,大量的信息向我们涌来:在我们曾经走过的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如今又发生了什么?我认为这是一种

净化力,至少可以帮助青年人获得更民主的意识。民主意识包括尊重别人,尊重那些具有不同见解或者不盲目轻信权威、希望独立探索的人。”^[3]

最后要说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戈尔巴涅夫斯基是一位相当年轻的学者,他属于在斯大林之后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大摧残之后走进科学领域的一代。这并不能说明作者的命运是一帆风顺的,恰恰相反,他和每一个有才能的人一样,在前进的道路上并非撒满玫瑰,而是布满荆棘。在我着手撰写这篇序言的过程中,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1950年,当谢列勃林尼科夫开始发表文章公开反对马尔主义时,时年35岁;而1988年,戈尔巴涅夫斯基在《文学报》上发表题为“关于泰斗的提纲”的檄文时,也刚好35岁。也许,当一个学者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完全做好了斗争准备的时候,便是他真正成熟的年龄。

戈尔巴涅夫斯基的“关于泰斗的提纲”的文章曾引起了许多新马尔主义者或那些昔日曾不光彩地“著名”过的人们的痛恨。而恰恰是在这篇文章之后,作者决定动笔写《世初有道》。完全有理由想象,此书将受到许多严肃的评论,甚至可能会遭到令人难堪的批判。因为此书不仅第一次揭开了苏联语言学历史中许多鲜为人知且自相矛盾的一页,而且触动了某些不久前还极欲实现独霸科学领域统治地位的人的利益。但他们的时代正在逝去,虽不如想象的那样快,但最终将会过去。

语文学博士、教授
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
1991年

注释：

[1]“B. A. 谢列勃林尼科夫”，《文学报》，1989年3月22日。

[2]波达波夫 H：“被崇拜的人物和被用来吓唬人的东西”，1989年3月31日，《真理报》评论员文章。

[3]萨哈罗夫 A. И：“只能用思想来同思想作斗争”，《新时代》杂志，1988年12月号。

引 言

或许你看不到，
岁月终将战胜顽石，
高耸的楼塔将离析坍塌，
寺庙能使神灵苍老？
偶像也终将走向颓废？

——鲁克列茨伊 《论事物的本质》